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yellow spiral that wind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top right.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dark purple silhouette of a person's head and shoulders, facing right.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yellow and purple.

岳麓书院山长考

杨布生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汉寿〕杨布生公页著

岳麓书院山长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9438

1099438

内 容 提 要

我国书院始于唐而鼎盛于宋，至清末仍在我国教育界具有极大影响。其中有岳麓书院为宋四大书院之一而称闻天下。这所书院其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主要是由于有一大批名山长掌教和讲学于此。本书就是考证其历届山长的开拓性著作。书中对五十三名山长的生平、掌教岳麓书院的教育活动和理论贡献及学术成就等方面，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证。本书资料丰富翔实，特别是地方志、家刻本、家谱的资料，弥足珍贵。这对于研究我国独具的古代书院教育具有极大的价值。

本书适用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教育史研究者和文史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岳 麓 书 院 山 长 考

杨布生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湘乡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200千字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5000本

统一书号：7135·184 定价：2.30元

前 言

为什么我会对岳麓书院的山长产生兴趣，并对他们作一番考证工夫？

说来话长。我本来不是学教育专业的，然而，我在岳麓山下生活了三十年。在这里念高中、上大学、做编辑，对“岳麓书院”有着特殊的感情，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碑一匾，都是十分珍爱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抚摸过宋代的遗墨“岳麓书院”和“忠孝廉节”碑。这些遒劲挺拔而又苍老的书法，不正是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光辉象征么？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北宋真宗皇帝重视教育的远见卓识，想起了南宋教育家朱熹对鼎新岳麓书院的伟绩丰功。我还不止一次地探寻着“岳麓八景”的遗迹：愿在“良夜花阴静，庭空皎月浮”的夜晚，能找到“花墩坐月”处一歇，领略“境（镜）悬心朗朗，人定意悠悠”的情味；每当“朝露未晞青欲滴，春波渐暖碧初浮”的清晨，总想能在“柳塘烟晓”处，看“曙景平添”，该别有一番吟兴，真是个来到了“试向林间聊徙倚，溶溶新绿尽消愁”的净境；长夏时季，在“晚景微茫”里，来到“风荷晚香”处消暑，也会顿觉“香清衣欲袭”、“幽香淡远中”；严冬来临，在“雪凝浓翠重，风抹冷烟匀”的“竹林冬翠”里，更会吟味“摇落看如许，青葱独可人。此君谁得似，鸾凤好为邻”。还有，“岩溜穿云一径轻，涓涓幽韵惬闲情”的“曲涧鸣泉”和“芳枝春放千株艳，暖气晴蒸半里红”的“桃坞烘霞”等等。这些，虽都已成历史陈述，但又禁不住使我想起了清乾隆时代的山长罗

典。“岳麓八景”是他添设的。他掌教岳麓书院二十七年，确实卓有成绩。三十年前，红叶满山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岳麓书院旁的爱晚亭畔，看到说明牌上写着：“爱晚亭，原名红叶亭，乃清代山长罗典所建。”那时，我不甚了了，但想他对岳麓山一定有所贡献，不禁对他产生了一种景仰之情。说也凑巧，这次写《岳麓书院山长考》，也是第一个从他开笔的。

还是在一九八三年秋季的一天，挚友杨金鑫副教授拿来几本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修复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岳麓书院通讯》给我看，并介绍岳麓书院从一九八二年起开始修复的情景。最后说明他是受修复办公室委托向我来约稿的。我当时听了，十分兴奋，觉得这是一件继承文化教育遗产的大好事。老杨对岳麓书院素有研究，《通讯》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他的大作《岳麓书院和朱熹》。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很有影响，深得美国教授陈荣捷的赞赏。我写什么呢？开始是有些胆怯的，因为我过去熟悉岳麓书院仅是其表象，对书院的实际内容却还是很陌生的。我和老杨一起琢磨，最后就选定罗典一题试试看。在撰写过程中，我发现，罗典固然是岳麓书院的名山长，多所建树。然而，象罗典这样的山长，岳麓书院还不乏其人。写了篇《罗典掌教岳麓书院事略》一文，在《通讯》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发表之后，又接着写了王文清、李文照（均已发表）、欧阳厚均和王先谦等掌教岳麓书院方面的文章。想不到，这些文章竟得到了方家们的好评。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一次书院学术座谈会上，从北京、上海、江西等地来的专家又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他们认为，研究书院先从山长入手，路子是对头的，还建议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命名为《岳麓书院山长考》（下称《山长考》）。不久，研究所又聘我为书院兼职研究人员，并把《山长考》和《山长文选》定为我的研究任务。后又蒙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李国钧教授推荐，决定《山长考》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

版，并把它作为一九八六年十月，湖南大学六十周年校庆、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院庆学术讨论会的书院研究成果之一。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缘起和经过。

要写好这么一本书，碰到的困难确实很多。首先就拿“山长”一词来说，要它的来龙去脉考证清楚，就不那么简单。

“山长”，是我国古代书院的主持人，相当于现代学校里的校长。他既负责书院的组织管理，又担负书院的主要教学工作。因此，有时又称其为“掌教”或“主讲”，即主某某书院讲席。那又为什么一般的都称“山长”呢？是否书院受佛教的影响，把“山中长老”一词借过来压缩而成的呢？目前尚未作出定论。《辞海》的“山长”条称：“①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为山长（见《荆湘近事》）。元代书院设山长，讲学之外，并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名院长，清末仍名山长。②宋雷简夫隐居时，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见《宋史·本传》）”。清代李元度在《南岳志》中亦称：“五代蒋维东居衡岳，受业者称曰山长，则又为山长之权舆焉。”看来，“山长”一词来源于五代，沿用于宋、元、明、清四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而岳麓书院的山长竟始于何时呢？这里有三条证明材料：一是《玉海》载，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山长周式呈请潭州太守刘师道扩建书院，“潭绮为记”；二是南宋教育家张栻《岳麓书院记》云：“李允则来为州，请于朝，乞以书藏。方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祥符八年（1015），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鼓箠登堂者相继不绝”；三是清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的《山长列传》也是用周式开篇的。据此，我亦把周式作为《山长考》的首届山长而开篇。

其次，要把岳麓书院的山长考证清楚，对书院本身的源流沿革和兴废更替不了解也是不行的。岳麓书院座落于湖南长沙

市岳麓山的抱黄洞下。它在我国书院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早在北宋时期，它就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但它究竟创始于何年何代何人？至今仍是一大悬案。据南宋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在其《赠了敬序》中记载：“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僧寺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由此看来，岳麓书院应创建于唐末五代之时，原为佛家寺地，是智璇和另一个和尚在此建屋购书，办起了一所士子肄业的学校，岳麓书院便在它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发展起来的。按理写《山长考》就应以智璇开篇。又据《大清一统志》载：岳麓书院“实彭城刘敖（鳌）创立。”刘敖何许人，履历不详。作为《山长考》来说，他应该是亚于智璇的第二号人物。再据北宋王禹称和南宋张栻等对岳麓书院的记载，北宋开宝九年（976），尚书郎朱洞任潭州太守时，他采纳了彭城刘敖兴学的倡议，正式创办了岳麓书院。他偕通理郡事的左拾遗孙逢吉，“于岳麓山抱黄洞下，肇启书院，广延学徒”。从此，岳麓的文教事业开始走向繁荣，我国的“千年学府”就由此奠基了。现在，我们就是依此第三说，把公元九七六年作为岳麓书院的诞生年。因此，《山长考》中的人物就再没有向上追溯了。

其三，由于书院的几度兴废和书院制度的不断变迁以及资料的严重缺乏，客观上给《山长考》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在考证过程中，从宋到清，一共翻出了六十名山长的名单（本书实际考证了五十三名），这就是宋代的周式、孙青、彪居正、张栻、吴猎、顾杞、黎贵臣、凌登龙、欧阳守道；元代的朱某、

张厚，明代的叶性、陈论、熊宇、张凤山、罗洪先、张元忭、彭宗旺、廖自伸、吴道行、郭金台；清代的刘自廷、王祚隆、蔡上宽、车万育、郭金门、李中素、刘大抚、刘琪、程佑祉、陈际鼎、廖俨、李文照、易公申、吴尧山、李天柱、曹耀珩、黄明懿、房逢年、王文清、刘芳玖、周焘、旷敏本、欧阳正焕、刘元燮、万莱峰、万年茂、张九镒、张樞亭、熊为霖、罗典、王坦修、袁名曜、贺长龄、欧阳厚均、龙瑛、丁善庆、周玉麒、徐葵、王先谦。这比《岳麓志》和《续志》的《山长列传》多了三十九名。《山长列传》中的二十一名山长名单是：周式、吴猎、黎贵臣、彪居正、欧阳守道、顾杞、陈论、叶性、郭金门、陈际鼎、廖俨、李中素、刘琪、李文照、曹耀珩、王文清、周焘、旷敏本、欧阳正焕、罗典、欧阳厚均。为什么一所“千年学府”的书院山长竟如此之少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书院办学不稳定，时兴时废，有时毁于改朝换代，有时毁于权臣专行，有时毁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元、明两代，实际办学的时间就很难考定。元代共97年（1271—1368），而开国的前二十多年书院被关闭了，到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才重修，“始复旧观”，至延祐元年甲寅（1314）又再修，“更撤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亭曰‘极高明’，悉如其旧。门庑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这说明书院在元代过去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43年）才“悉如其旧”。加上元代的山长已正式列为官阶，各级书院的山长，均为各级地方教育管教育的官吏或者是由其兼任。因此，除了在吴澄的《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提到“朱某、张厚相继为长”之外，其他志书和诗文中，再也找不到元代其他山长的名单，即便是朱某、张厚，也未查出其履历。这就实际形成了元代山长研究中的一段空白，也是这本《山长考》的一大憾事。明代的情况比元代更不如。元代末年（1368），书院毁于战火，“寻毁为墟”，破

坏最为严重。经百年之后，至明成化五年己丑（1469），知府钱澍才因旧址重建礼殿和北海碑亭等，但“重兴随毁”。至弘治七年甲寅（1494）通判陈钢再建，当时“殿址故在，而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其址与食田皆为僧卒势家之所据矣”。直到弘治九年丙辰（1496），知府王瑄、同知杨茂元续建，“备所未尽，始复其旧，又稍具前规模”。明代共276年（1368—1644），这里就去了128年，书院办学的时间就只剩148年了。其后这一百多年时间里，书院又修建频繁，据志载大小修建活动达二十多次，加上明廷及其权臣张居正等几次令毁书院，对岳麓书院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因此，明代见诸志书的山长也很少，《岳麓志·山长列传》中只有陈论、叶性两人。二是书院山长的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一般都不很高，名不见经传者居多。尤其在清乾隆元年以前的漫长时间里，山长的资格不很强调，有时只要老成一点的诸生就可以了。按照规格，这些山长的传记就很难上省志、县志，能在县志、府志的选举志上找到他们的名字，就算是很满足的了。因此，在考证过程中，得来的片言只语或某些蛛丝马迹，我都没有轻易放过，并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珍贵材料罗列起来记在每一个山长的名下。这样就使得每篇文章的格调不是那么一致，行文的长短也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篇是洋洋万言，有的篇也就只能是三言两语了。

《山长考》草成后，掩卷沉思，究竟它有何价值呢？我觉得从这些山长身上能受到如下三点启发，可供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们借鉴。

一、岳麓书院的山长们，堪称是一批懂教育的内行。他们这批封建时代的教育家，深懂教育的社会作用。他们的教育思想都贯串着一条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张栻认为，举办书院的目的在于“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他以“经世致用”为教学目标，

因而培养了一批“经济之才”，在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教诸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明清之际，一些山长虽然在教学方面受科举影响颇多，但多数山长是不满制艺时文的，指出了时文的种种弊端，而提出了“正文体”的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仍很突出。明代山长张元忭、清代山长王文清等，都表现出务实学的倾向。他们既注重传授学术，更重视学以致用。王文清的“人求多闻，时维建事；治学有斋，苏湖之制；礼乐兵农，经天纬地”的学箴，就是鼓励学生们研究有用之学。在教学的形式和方法上，多数山长都倡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密切结合，形成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学术派别。这对于繁荣学术和培养人才都有好处。他们提倡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答难论辨，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等，这对于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能动性、探讨学术以及培养研究学问的能力方面，均有他们的长处。

二、岳麓书院的山长们，都比较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他们把教书育人置于首位。首届山长周式以行义著，鼓箴登堂者相继不绝。张栻主教岳麓，一开始就大讲公私义利之辨，为学进德之序。吴猎、欧阳守道等都是重德育和重人格培养的，特别是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清代山长们制定的学规最多，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德育的。清代教学除讲制艺、汉学外，还讲理学。这时所讲的理学，主要不是学术传授，而是一种道德教育。这种教育，当然是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强调公私义利之辨、贵践履而黜空谈等道德教育，在培养学生为顾全大局而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道德情操方面却是富有成效的。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一个民族矛盾问题。岳麓诸生在反抗民族压迫的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为维护正义而斗争的高尚情操。南宋岳麓诸生一大批为抗击元代统治阶级的武力侵略而英勇捐躯，成了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明末山长吴道行和学生王船山

的反对清统治者入据的义举，成为一代佳话。清代学生魏源、左宗棠、唐才常等人的反帝爱国思想和言行，亦足以为人们所钦敬。这一切都和历代山长的重德育、重人格培养的教学效果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更可贵的是这些山长们都较为认真地实行道德践履，言传身教，既为经师，又为人师。文天祥在祭他的老师欧阳守道时称赞备至，说先生其真如赤子，其慈如父母。与人相处，如和风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还有如兵科掌印给事中车万育、崇祀东流县名宦李天柱、吏科给事中周焄、崇祀乡贤李文照、旌表孝子易公申等，都是一批封建时代尽忠尽孝、道德修养很好的山长。

三、岳麓书院的山长们，都很注重学术研究，都有其学术专长并自成流派。他们真可谓把书院办成了既是教学中心又是学术中心。在书院的鼎盛时期，也就是学术研究的繁荣时期。宋代理学和书院并起，明代心学和书院同盛，清代汉学的复兴，又在书院大放异彩。南宋山长彪居正和张栻等就是有名的理学家，他们把书院办成了湖湘学派的基地。“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湖湘学派既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传统，又有其自己的特色和主张。张栻的哲学观点，以性为宇宙本体，超越了过去仅把性范畴局限于人性方面的意义，使之成为最高哲学范畴，这对丰富学术思想、提高理论思维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不偏一说，兼容并包，不仅兼收朱陆之学，而且并蓄心性之学和事功之学，表现出非正宗的事功倾向。到了明代，心学盛行。最早到岳麓书院传播心学的是王阳明本人，继而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罗洪先、季本、张元忬、邹元标等都先后来书院讲学和掌教。山长张元忬在学术上“以万物一体为宗，而以明明德于天下为愿”的思想，对书院诸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到了清代，书院除继续传习理学外，还传授以训诂考据为中心的汉学，山长王文清、罗典、旷敏本、王先

谦等，本人就是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他们在书院著书立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王文清的家乡被命名为“经学之乡”。王先谦广刊要籍，著述等身，启迪群流，楚学生光。尤其是道光时，岳麓书院又专辟了不搞科举制艺，主要研究汉学的“湘水校经堂”。他们这种对汉学的研究和传习，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

《山长考》在成稿过程中，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华东师大出版社和湖南师大图书馆的同志们曾给我以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特别是责任编辑刘凌同志在书稿的审定中花出了艰辛的劳动；还有我校图书馆的张舜华、赵振兴和省图书馆的刘志盛等同志为热情寻找资料，帮了大忙，特别是舜华同志帮我突破了不少难点；还有我家的四个女儿岳平、闾平、九娣、特英及老伴彭定国同志对我的精神鼓励和时间上的支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因为在书院这门学问的研究上，还是个开荒性的工作，加上时间短、材料乏、撒的面宽，上下千余年，没有这么多同志的帮助和支持是不可能成稿的。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杨布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完稿于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

院書麓嶽

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额



康熙岳麓志所载明代岳麓书院图



山长张 栻



山长王文清 →



清代岳麓书院图 ←

康熙岳麓志所载



山长罗典



山长贺长龄



山长欧阳厚均



山长丁善庆



山长徐棻



山长王先谦